

南昌起义  
前的  
贺龙资料选编



21

- 贺龙史实资料选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紀念賀龍同志九十周年誕辰

精神永在  
亮節可風

王首道一九八五年冬

紀念賀龍同志九十

壽長

於漢生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 目 录

王震同志谈贺龙	( 1 )
彭真同志谈南昌起义前的贺龙	( 4 )
我所知道的父亲早年的革命活动	賀曉明 ( 6 )
贺龙的家世	桑植县政协 ( 16 )
附录：清武庠生賀公衡山先生墓表	( 24 )
童年学武	賀學望 ( 25 )
贺龙跟我赶骡子	张盛勋 ( 27 )
“湖南骡子客干的”	賀學株 ( 31 )
少年时代识贺龙	徐小桐 ( 33 )
熊壁岩被捕经过	李秀清 ( 35 )
贺龙沅陵脱险	余钟权 ( 37 )
在雄磺矿当矿工	卓其凤 张敬臣 ( 39 )
在雄磺矿的斗争	湖南省雄磺矿 ( 41 )
贺龙数次到我家	胡薛军 ( 43 )
在泥沙河等地夺枪起义	张大发 ( 45 )
芭茅溪打盐局之经过	韦寿云 ( 47 )
南北墩巧计夺枪	谷伏瑞 ( 50 )
轶事二则	龚桂生 ( 52 )
贺龙买花桥	桑植县政协 ( 54 )

驱逐卿衡	顾莫国	( 55 )
我讲几件贺龙轶事	贺锦章	( 56 )
贺龙修智莲纪念碑	桃源县政协	( 60 )
贺龙在苗乡的几件事	中共泸溪县委党史办	( 61 )
我和龚福卿跟随贺龙的往事	余自秀	( 64 )
贺龙入川点滴	邱著双	( 68 )
回忆贺龙在彭水	刘和松等	( 70 )
威震日轮宜阳丸	涪陵市史志办公室	( 78 )
我所见到的日轮宜阳丸被扣	文德铭	( 81 )
△回忆贺龙早期的革命事迹	汤祖坛	( 83 )
“贺青天”在铜仁	郑小洲	( 88 )
△我忆贺龙	翁淑馨	( 91 )
贺龙重教育重人才	谷佑箴	( 96 )
松桃人民怀念贺旅长	松桃苗族自治县政协	( 99 )
智取秀山	刘云安	( 101 )
贺指挥军纪严明	张鑒炳	( 103 )
附录：四川陆军第九混成旅司令部命令		( 104 )
贺龙在澧县	万邦义	( 105 )
附录：贺龙通电就澧州镇守使职		( 107 )
琐忆澧州军士教育团	龚泽湘	( 108 )
贺龙在澧县二三事	黄德镇	( 112 )
九澧平民工厂的由来	津市市政协	( 114 )
贺龙在澧州筹粮救灾	津市市政协	( 115 )
贺镇守使在津市倡导半工半读	津市市政协	( 117 )
我在贺龙身边	李原才	( 119 )
附录：贺龙的一份电报		( 122 )

两张布告	陈自南	(123)
贺镇守使回故乡	郑伯祥等	(125)
“今年起屋明年烧”	贺士竹	(127)
对贺龙在澧州和武汉的片断回忆	唐小洋	(128)
回忆贺龙将军两次到铜仁和率师北伐	刘应铭	(132)
给贺龙献锦旗	曾南乔	(136)
贺龙关心士兵	傅胜	(137)
忆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	丁志扬	(140)
我在政治讲习所学习前后	杨白泉	(144)
回忆贺龙同常德学联代表的谈话	康序涣	(147)
贺龙关心青年学生	李清烈	(149)
桃源各界欢送贺师长北伐	熊新民	(151)
公安之战	刘达五	(153)
贺师长进驻宜昌目睹记	吴远笑	(155)
我跟随贺龙的历程	张应祥	(157)
贺龙保护文物古迹	融广	(163)
谌家矶士兵“闹饷”记	刘应铭	(164)
贺师长督阵“太极军”覆没	刘应铭	(167)
回忆与贺军长的接触	韩浚	(168)
与贺龙相处的日子	陈君兰	(171)
贺龙斥汪讨蒋	朱泽云	(173)
八一风暴前夕	刘达五	(182)
贺龙前三十年纪事	贺晓明 朱泽云	(187)
后记	编者	(216)

## 图 片 目 录

- 贺龙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时的照片
- 贺龙同志家乡洪家关镇 (唐克立 摄)
- 贺龙同志洪家关旧居 (唐克立 摄)
- 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题词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题词

## 王震同志谈贺龙

贺龙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贺龙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赤胆忠心，艰苦奋斗，为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爱戴。

我和贺龙同志是在一九三四年红二、六军团会师时认识的。贺龙同志非常健谈，常对同志们讲自己的经历，加上在这之前听到的关于他的传奇式的传说，所以我对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也有一些了解，最突出的感受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有为被压迫的穷苦人民谋求解放的迫切愿望和为之献身的坚强毅力。一九一四年，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不久，他又“两把菜刀闹革命”，名扬四海。他还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这期间的贺龙同志还是个民主革命者，是民主革命的活动家。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贺龙将军还不是党员，就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道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并任起义军总指挥。在我们党受到严重挫折，很多人脱党甚至叛党，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贺龙同志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里。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和为之奋斗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人钦慕。在我党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求留在国内，到农村组织工农红军，在实践中探求中国搞武装斗争的经验，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与贺龙同志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很深，今天回忆起来，

还是记忆犹新。他待人热情，诚恳，豁达大度。他密切联系群众，是元帅与战士同甘苦的表率。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辟和巩固湘鄂川黔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率领部队，打过多次出色的歼灭战；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里，他所指挥的许多重大战役和战斗，都表现了他是一位有卓越的指挥才能的军事家。贺龙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感到，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贺龙同志党性强，大公无私，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是从大局着眼。他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一九三四年底在敌军重兵压境，我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指挥我们占领湘西五座县城，大量杀伤敌人，调动和钳制了敌人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命。抗日战争时期，晋绥根据地遭到敌伪顽扫荡破坏，部队供给异常困难，贺龙同志在这里，和晋绥军队吃黑豆糠麸，同甘共苦，带领部队团结人民，生产自救，节衣缩食，度过了难关。

贺龙同志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始终把部队看作是党的部队，坚决服从党的指挥。对于自己工作的调动和使用，也是这样，党分配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心悦诚服地执行党的决定。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决定他离开二十军去香港，作为一个新党员，他没有任何怨言，坚决服从命令。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北这个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资源极缺的地区，作了大量的后勤兵运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下，配合华北聂荣臻同志和西北彭德怀同志，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贺龙同志在几十年的斗争生涯中，走过坎坷里程，特别是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直到最后一息。他忠于中华民族，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贵品德，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贺龙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十年动乱中，他不幸遇害与世长辞。作为他的老部属，我对贺龙同志的怀念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

（摘自王震同志为《贺龙年谱》写的序言）

## 彭真同志谈南昌起义前的贺龙

贺龙同志在北伐前当过旅长、师长，当过镇守使，后来为什么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些人强调了贺老总出身贫苦。我认为不光是出身苦。出身苦仅是一个条件。许多人出身不好为什么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出身苦的人为什么却走上了反革命道路？贺龙同志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不仅是因为出身苦和个人性格，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二七年的近九十年中，中华民族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蹂躏。这反映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贺老总……和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于是，就起来斗争，这样就成为一部历史。贺龙同志和贫苦群众生活在一起，反映他们的要求，反映他们的历史。他不安于现状，用种种方式同旧社会斗争，从斗争中找出路。他找过孙中山，接触过汪精卫。以后，蒋介石在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和许克祥在长沙“马日事变”大屠杀，汪精卫嘴上反对，心上支持；被屠杀的都是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贺龙同志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贺龙部队里早就有共产党员，周逸群同志就是一个代表，贺龙也知道共产党在发展党员。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周逸群发展一个下级军官入党，这位军官跑去问贺龙：“可不可以加入？”贺龙说：“赶快去参加。”贺龙对他的部队情况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汪精卫、蒋介石想进去搞特务活动也搞不了。

贺龙在与共产党人长期接触中，接受了马列主义。他在复杂

的社会现象面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个一个党派作比较，一个一个领袖人物作比较；由表及里，他从现象看到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不顾个人安危，于是他把个人命运同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同志让贺龙同志当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依据就在这里。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在旧社会，贺龙是一个很不安分守己的人，他当旅长就委军长。贺龙同志在我们党内，又是最安分守己的人，党性很强，夏曦杀了他手下那么多能征善战的好同志，贺龙流泪了，关向应也流泪了。那时，夏曦是中央代表，不能不服从。贺龙是旧社会的叛逆者，在我们党内却是驯服工具，驯服的党员，驯服的干部。

贺龙同志千方百计地掩护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他这个人看来很粗，其实不然，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他对一个人见一两次面，就能看出八九成，他见过一面的人，多年后还叫得出名字来；一些问题，他放进脑子里，可以装很久，叫你察觉不出来，到一定时候，他才讲出来。可见他粗中有细。他跟着共产党搞革命，舍己为人救中国的老百姓，是有着厚实的思想基础的。

（摘自彭真同志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  
对贺兴桐等的谈话）

# 我所知道的父亲早年的革命活动

贺晓明\*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人民军队创始人之一的贺龙同志，我的父亲诞生九十周年。

父亲生前常常以党的光辉历程教育我们子女，还向我们谈过许多他早年的革命活动。这一切铭刻在我们心中，永志不忘。

父亲亲身经历了新旧民主革命两个阶段。他是大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左派将领，又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从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到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仅同我国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是彻底的民主革命者，而且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

贺龙于一八九六年阴历二月初九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

桑植毗邻湖北，紧连贵州、四川。贺龙自出生到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以前，是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度过的，这一带山高路险，地瘠民贫，地方势力设置许多关卡，

\*贺晓明是贺龙同志女儿，现在总参政治部工作，文中内容大多是贺龙同志生前对她讲述的。

盘剥百姓，因而历史上这里发生过多次农民反抗官府的起义。山里人剽悍豪爽、不畏强暴、吃苦耐劳的性格，在贺龙身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贺龙家里只有四丘田，其中一丘是和别人合伙种的，并同邻居合用一头牛，屋后有块小菜园。贺龙很小就在大姐贺民英带领下，帮助大人干活。家里曾给贺龙取名振家，指望他将来兴家立业。他五岁时入私塾读书，天资很好，先生每天教的书都能当堂背诵。在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年月里，贺龙很是厌恶“圣人之言”，他和同窗一起讨论过长大后做什么。有个师弟说，长大了想当保董。贺龙听了很生气，把这个师弟打了一顿，骂他没出息。挨打的师弟不服气，反问贺龙长大后做什么。贺龙拍着胸脯说：“我长大了，要专为穷人打保董。”贺龙念了几年书，后因砸了孔子牌位，被迫离开了学堂。

由于家计艰难，贺龙辍学后，帮助家里种田、打草。不久，同几位好友结伴去湖北、四川、贵州贩运盐、茶和骡马，从此走入社会。在这一段赶骡马、搞运输的艰苦生活中，他目睹了官匪豪绅欺压劳动人民的罪恶勾当，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疾苦。他常说：“这个世道，不平的事太多了。”打富济贫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逐渐萌生了。

## 二

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夺。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斗争。这年，桑植县有个陈图南，是中华革命党党员，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他找到贺龙，并向贺龙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说：“中华革命党坚决反对北洋军阀，要改革政治制度，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贺龙听了，非常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并由陈

图南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贺龙加入中华革命党后，革命党通过陈图南交给他三项任务：杀掉本县恶霸朱海珊；派人到警备队当兵，了解警备队情况；带队伍去当团总。杀掉恶霸是贺龙的愿望，但因当时力量不足，不便马上执行。至于派人去警备队当兵，很快就办到了。由于他平日最恨欺压百姓的团总，当团总的任务没有接受。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不久又恢复帝制，受到全国人民反对。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九一六年二月，贺龙在桑植县芭茅溪组织“两把菜刀”起义，投入了护国运动行列。他在生前回忆说：“一九一五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联合人，又把石门县团防局的枪提了。转来碰见我的叔父，我说斋公，我们去提盐局的枪好吧？于是，我们又调头搅盐局去了。这一来，我们就进攻大庸，人数也增加了。”这次起义后，发展到一千多人，贺龙任民军总司令，声势很大。随后他带着队伍杀掉了恶霸朱海珊，接着攻打大庸的反动派。当时，民军没有经过训练，听到前面有失败的消息，队伍就散了。

贺龙回到桑植很快又组织起一支队伍，发动了大庸、慈利、永顺、桑植、龙山五县农民暴动。占领了永顺、龙山、桑植三县。经与蔡锷指挥的护国黔军前敌总司令王文华联系，得到王的支持，他被委任为湘西护国军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

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为了反对谭延闿的统治，贺龙赞成湖南中华革命党提出的“攻谭、杀赵、灭梅”口号。革命党通过廖湘云布置贺龙用手榴弹炸谭。后因走漏风声，贺龙被捕，经革命党人与谭延闿谈判，贺龙才获释出狱。他曾经回忆说：“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它使我认识到搞暗杀是无益的，没

有军事力量成不了什么事情。我认为必须着手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但由于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贺龙陷入了一种苦闷之中。

### 三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常德、桃源师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走上街头抵制日货，追查奸商，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贺龙受到很大鼓舞。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贺龙驻防湖南桃源时，从上海来了两个学生，一个是他的老相识陈图南，一个是陈图南的朋友花汉如。他们带来很多书籍，贺龙常同他们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并听他们辩论。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主义，漏洞百出；花汉如介绍的社会主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深深吸引了贺龙。而且贺龙经过前段亲身体验，这时已觉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设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问花汉如：“有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花汉如告诉他：“在外国里，就是共产党。”

这是贺龙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思想。这次接触，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曾经回忆说：“我知道共产党以后，就注意这个党了。”他在五十岁生日讲家史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提到民主革命时期同他在一起的人，其中特别讲了陈图南和花汉如，并说：“这些人对我是有帮助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贺龙逐渐成熟起来，更加积极自觉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贺龙在四川同投靠吴佩孚的袁祖铭、杨森、刘湘等军阀作战。吴佩孚用日本轮船宜阳丸给杨森运送军火，被贺龙的参谋瞿伯魁等发现，密报贺龙，当宜阳丸开到涪陵时，贺龙和汤子模下令扣留了这艘日轮。经过检查，没收了全部军

火并扣押了船上的日本人官崎和高桥。日本领事馆官员在吴佩孚的代表陪同下，气势凶猛地质问贺龙：“官崎和高桥犯了什么罪？”贺龙挺着胸脯，双手插腰，义正词严地答道：“你们听着，偷运军火，助长内乱，犯的是杀头之罪！”吴佩孚的代表在旁威胁说：“这是吴大帅的意思。”贺龙一听，愤怒地答道：“什么大帅不大帅，我贺龙管不着，你回去告诉曹锟、吴佩孚，他们讨好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是没有好下场的！”

一九二四年贺龙在沅陵驻防时，看到一块大石碑。这块石碑是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为镇压当地群众而立的。碑文上刻着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惩办辰州文武官员的“上谕”，贺龙看后说：“这太可恶了，太欺侮中国人了，打死一个为非作歹的洋人，赔了几十万两银子，杀了两个正将和两个游击，都要一五一十写上，立他妈的这么大一块石碑，好象生怕中国人的脸丢不完似的，太可恶了！”于是，他命令部下把这块耻辱碑砸掉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下旬，赖心辉和刘湘谈判达成协议，赖当了四川省长，四川境内的战争结束了。贺龙入川作战多年，见到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认识到跟他们干没有出路，于是打定主意回湖南，等待时机消灭赵恒惕。不久，他派出使者去广州与孙中山先生联系。不巧，使者到达广州时，孙先生已去北京治病。

这时候，又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促使了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变。

一九二四年春天，中共湘区委员会根据中央“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斗争中，决定的要素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的指示，在各地寻找有革命倾向的部队，并派陈章甫到湘西了解部队情况。陈章甫找到了贺龙，谈得非常融洽，贺龙爽快地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这是他与共产党人